

#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the Dilemma of Literary Education

Yu Guo\*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673363746@qq.com

## ABSTRACT

Current knowledge of literary disciplines is a system of discours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formal methods, which contradicts literature as a metaphorical and poetic activity. The manifestation of literary education is the closure of educ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modernity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se phenomena, so the way out for literary education should start from aesthetic modernity. Specifically, it is to improve the tendency of scientific and formalized dominance of the literary discipline and to bring back the literary nature of literature, for which the current cultural studies provide ready insights and direct influence.

**Keywords:** *Literary discipline, Literary education, Intellectualism, Cultural studies.*

## 学科知识的建构与文学教育的困境

郭彧\*

湖北科技学院, 咸宁, 中国  
\*通讯作者. 邮箱: 673363746@qq.com

## 中文摘要

当前文学学科知识是按科学化原则和形式化方法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这与文学是一种隐喻性的诗性活动相违背,表现在文学教育之上即为教育的封闭化,文学与社会实践接口的缩减。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是导致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为文学教育寻出路应从审美现代性着手,具体而言就是改善文学学科科学化、形式化一家独大的倾向,使文学的文学性重新回归,当前的文化研究为此提供了现成的启示和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文学学科, 文学教育, 知识学, 文化研究*

当前文学教育陷入到困境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内部而言,文学教育所依赖的知识体系存在较大的缺陷。现代学科的知识建构,必须有明确的知识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并能指导相应的知识实践,然而当前的文学知识架构虽有其自明性的知识对象——文学活动,但知识方法和理论建构却多是借用自其他学科领域,本身并未构成一个自洽的学科体系。

就外部而言,文学教育的社会接口日趋狭窄,当前大部分的文学教育接受者无法直接地在社会中表现出自身的“有用性”,无法在场域高度分化、职业分工日趋细致的当代社会中找到直接定位。这一点直接影响了文学教育再生产的持续,也让文学教育的出路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 1. 知识学身份定位的难题

当前中国的文学教育，在学科上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这一一级学科，主要活动场域是各高校的中文专业，表现在课程设置上则是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大块。其中，文学理论是“以文学的普遍的规律为其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它以文学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其研究对象”。<sup>[1]</sup>而文学史是对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是文学具体历程的整体描述。至于文学批评，则是利用文学理论，对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的分析、评价和判断。

不难看出，文学教育的这种规划暗含了一种“前见”——文学知识是一种科学知识，它有自身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科学方法”，因此，文学研究乃至文学教育，必须围绕这些规律、原理、方法进行。与这一“前见”伴随而行的是文学学科的形式化，即文学研究采用“非指涉性的纯粹符号构成抽象的公理或模型来对意义进行普遍有效的阐释”。<sup>[2]</sup>它“以一组抽象概念结合成一个能够独立生产意义的逻辑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全部语言活动，从而获得普遍有效的阐释权力。”<sup>[2]</sup>

问题在于，文学是否真是一种科学？作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学科知识体系，科学一词意味着可重复性、普遍性、必然性、唯一性。然而，现实中的文学活动并不具备这种规律性，从古至今，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形形色色，从未找到一个绝对化的标准，也从来不能对其进行客观层面上的证实或证伪。在历史上，有人谈诗言志，则有人说诗言情。有人认为创作是文学活动的中心，则有人认为文本才是文学活动的唯一。有人从外部寻求文学的规律认识，则有文学社会学。有人从内部寻求对文学的认识，则有文学心理学……这些话语的堆积除了说明对文学我们可以有、而且也必然有多种看法外，并不能证明文学活动自身的规律性。

而且，更令人恼火的是，所谓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方法从来都是对其它学科的挪用，文学学科必须要依赖他者才能建构自身。如冯黎明先生所言：“即使我们把圣伯夫以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视作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知识形成的过程，但实际上十九世纪以来的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是靠从其他学科那里借取方法、观念以及术语、概念来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虽然有自己的考察对象即文学活动，但它对文学活动的阐释视点和阐释方法，却依赖于其他学科的供给。”<sup>[3]</sup>余虹先生也认为，在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对其他各种方法论进行种种借用的文学理论，“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中，我们总是看到哲学理论、神学理论、儒学理论、道学理论、佛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伦理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等，唯独看不到独立于这些理论的文学理论。严格说来，文学理论自身并无理论，它只是对形形色色理论的运用，是这些理论的影子。”<sup>[4]</sup>

文学知识的建构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有损尊严的做法，根本原因在于：文学活动本身是一种诗性语言活动，其意义是隐喻性的，可随着文学活动参与者的主观性而进行无限的生发，因此文学的意义不存在一个确定的边界，更不是一个客观的、可被理性精确把握的存在。然而，现代性学科知识存在的前提是要为自身寻找到一个客观的合法化原则，需要一个元理论叙事，一套相对统一的阐释方法，这一切恰恰与文学的现实存在相抵牾。面对这种尴尬，文学知识建构者的解决之道往往是引进其它学科，并将文学知识的合法性依附其上。

比如“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学的依附。康德将美定义为“一个对象的符合目的性的形式”，并假定了共同感觉力作为美感传达的基础，美因此获得了广泛有效性，“美学”也因此具备了知识的合法性。于是当人们把审美理解为文学的本质时，美的这种有效性、合法性自然也就直接为文学所有。当然，康德美学只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文学研究中所有有影响的理论的产生莫不如此，都可以看做是对某一具备合法性的学科理论的依附与占用。而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得文学理论或者是哲学的、或者是社会学的、或者是伦理学的、或者是政治学的、或者是历史学的、或者是语言学的、或者是心理学的……这背后，体现的是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隐秘欲望——如果文学研究找不到合法依据的话，那通过这种依附，文学学科也许能共享到别的学科的合法性依据。

问题是，文学活动因其本身是一种诗性话语活动而拥有无限的阐释潜力，阐释者本身的主观性使得文学意义的理解被多元分化，“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话同样也可用于文学知识的建构者身上，因此依附其它学科以获取合法性的做法最终结果乃是让文学学科中充斥了大量的知识话语堆积而无法建立一个元理论叙事，这反过来损害了文学学科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文学活动根本上是一种符号意义的生产流通活动，科学化的文学知识并不存在。当前的文学学科只不过它借助形式化的做法，成功地为自己套上了科学的外衣，建立了文学活动是有规律性、能被理性把握的存在这一信仰幻象而已。因此，当前的文学教育体系的目标在于给人以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但其现实效果恰恰相反，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显然不可期，而文学的本性也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了。

## 2. 面对强大的工具理性

当代社会，学科的维系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话语在实践领域中的作用。比如法拉第的电磁学是现代电力工业的前提，而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则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学理基础。任何学科，都存在学科理论与学科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唯有推动实践，方能维系自身的存在。

然而，当文学知识被罔顾其本性地定义为科学知识，所探索的对象是并不存在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科学方法”时，文学学科的外部实践就遭遇了种种难题，这些难题表现在文学教育上即呈现为文学教育的封闭化。

所谓封闭化是指当文学教育的内容被定义为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并成为唯一的学科话语时，文学知识生产开始远离文学自身的感性特征，文学教育于是进入了一个封闭的象牙塔中，与社会、历史相脱离，并失去了介入、实践的功能。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因此趋于无用化，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力也日益衰减。

在当今文学学科的构造中，文学教育所能够培养的对象只能是教师和研究人员，因为唯有教师和研究人员才能够起到再生产、延续文学学科是一种科学的信仰幻象的作用。而这样的学科构造也只适合于评项目，搞研究，对于其它的职业需求在事实上无法兼顾。这一点也可以从“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大家心照不宣的认识中见出。这话从文学学科的教学内容上看并不为错——既然文学教育教授的是“规律”，那它与作家所具有的灵感、才气等非确定因素当然是格格不入的。问题是，如果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那作家应该由哪个系培养？如果说作家还是一份有潜力的职业选择，它天然与中文专业相契合的话，那中文系是否该反思自己学科建置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文学教育的封闭化隐忧应当说在文学学科建立起来之际就已存在，但在中国却一直直到九十年代后方才得以逐步暴露。建国初期，内地的文学教育被纳入到了整一性的国家意志之中，学科虽然存在，但其知识体系、外部实践、职业选择全部由强大的国家意志全权决定，在这种大封闭中，文学教育的封闭性被成功掩盖。改革开放后，文学经历了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重新学科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旧体制的庇护依然残留——大学生不必忧虑出路问题，国家对此全权负责，另一方面则是时代产生的新需求——人们渴求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寻找精神解放的新的社会主题，而被理解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与此恰好相符。两者的一拍即合使得当年的文学教育出现了高度的繁荣。然而，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不可复制的，极为特殊时光，当时文学所扮演的是一个富有感性特征的启蒙工具，而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知识学科。

九十年代后，政治热情消退，体制化的知识体系加速建立，学者们开始躲入象牙塔之中。同时，伴随着时代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文学教育的潜在矛盾——学与用的不兼容，学科体制与研究对象属性的对立——终于在此时爆发了出来，其具体表现就是中文专业不再热门，其外部社会接口回缩。

其实，文学作为一种诗性话语活动本身具有反作用于现实的强大实践潜力。在历史上，时代的变革中往往可看到文学的身影，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戏

剧，启蒙时期伏尔泰、卢梭的小说，浪漫主义时期的拜伦、雨果，现实主义时期的托尔斯泰、果戈理……更不用说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及其中的诸位干将了。他们的文学活动直接辐射到了整个社会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与演进。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也早就证明，所谓封闭的文学场域从来也不封闭，符号资本一直在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发生种种流通与交换。当某一文学活动能产生强大的符号资本时，它往往也意味着更为广大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于是，话语实践导致了现实的实践，文学对社会的影响从而可能。

当今文学教育的窘境其实是科学化教学模式限制了文学的内部潜力所导致的一种后果——当前文学教育的对象只是文学知识而不包括文学修养、人文素质，后者更多的倾向文学那未被现代学科体制规训的本性——文学的诗性、符号意义的无限阐发。然而，文学与社会的连接，往往依赖的是后者。比如，当今一部热销小说改编为电影上映并获得不错的票房，造成强大的社会反响，这其中文学知识的作用并不大——凌空蹈虚的理论家永远是少数，票房的形成，社会反响的获得在于这部文本的潜能能够激发并满足众多读者不同的情感需求和意义体认，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引发了资本的流通、权力的交换。

当前社会其实存在大量与文学息息相关的职业需求，而封闭化的文学教育对此却未能重视。如当前人们普遍承认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典型业态。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知识创新不断加速、传播媒介不断更新、新兴文化业态不断出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产业人才的重要性更是急遽凸现。……然而，相比于火热的文化产业实践，我国的文化人才还存在总量偏少、精英不多、结构失衡、分布不均等问题，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sup>[5]</sup>高校不是没有相关的应对举措，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你培养的不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的你没培养出来”，“高校不对路，企业不对眼”，“高校自我封闭又孤芳自赏，企业用人有方而选人有责。”于是“高校自律”与“社会选择”的落差开始出现并变得难以调解。<sup>[5]</sup>

### 3. 探寻可能的出路

应当说，当前文学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源在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方案包括三大主题，即客观化的科学知识，普遍化的道德和法律，自律化的艺术，而这三者又分别表现为科学的认知——工具理性，伦理的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的审美——表现理性的分离。<sup>[6]</sup>不难看出，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走向是认知——工具理性的体现，但艺术本身的归属却在审美——表现理性这一块，两者间存在深刻的矛盾。艺术本身是想象的个性化产物，既不具备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也不具备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它只是要求

自律，为自身的自由活动提供一个不受限制的土壤而已，因此，艺术本身是抗拒学科化的。然而，现代性的矛盾要求艺术除了自身的实践外，还必须能在理性面前证明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学科的存在，这具体到文学上面来则是文学理论、文学学科的出现。

这里面其实是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启蒙现代性要求秩序，是对理性主义、合理化、科层制等工具理性的片面强调，它要求普遍的意义，同一的规范，而审美现代性则关注感性和欲望，差异与个性，是审美——表现理性的外化。然而，毕竟现代性一开始就是对统一秩序的追求，启蒙现代性才是现代性工程的根基，作为启蒙现代性的对立面的审美现代性在事实上也是依附于前者才得以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学科的出现作为一种理性的证明便成了一种必然，同时文学学科与文学性的差异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可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当前文学教育的困境，它造就了文学研究与文学活动之间的错位，同时，文学学科体制和知识构造的形式化加强了这一错位，并使得文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接口差异越来越大。因此，解决文学教育的困境应从加强审美现代性的力量，缓解启蒙现代性的压迫入手。具体而言，就是要改善文学学科科学化、形式化一家独大的倾向，使文学的文学性重新回归，从而打破文学教育的封闭化，进而实现其社会实践接口的扩展。

修正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形式化倾向，恢复文学的感性可以从修正科学主义的真理观，正确认识文学研究的反思性、文本性，在阅读体验的基础上重新建设新的文学理论入手。海德格尔就曾提出过用存在论的真理概念来替代传统认识论的真理概念，即将真理理解为“去蔽”，理解为意义的自我显现，而不是将之理解为陈述与对象的复合。真理应当是“此在”在生活世界中的言说，而不是理性主体对世界的无情把握，“诗”是这个世界的意义之源。海德格尔的这种认识无疑给我们以启发：文学的真理不见得一定得是对工具理性的依附，它也可以是感性的言说，是审美——表现理性的表现。

当前的文化研究为我们破除文学教育的封闭化提供了现成的启示与直接的影响。与传统学科喜好寻求一种单一的元理论和统一的阐释方法不同，文化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性，是多种学科视野多重交互形成的学科场域，并因此具备了全新的学科视界。文化研究不局限单一的视角和立场，而是在阶级、种族、性别的多重立场上对文化现象进行关注，其方法论是近代以来各种主流学科方法论的汇合，包括了话语结构分析、症候分析、批判理论、弗洛伊德主义、阐释学等等，是这些方法的综合融通。它也具有高度的实践品格和开放性特征，“关注的是工业社会内部，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简言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工业社会内部的特定生活方式，它是此种生活方式一切社会经验的意义生产和流通。”<sup>[7]</sup>

这些，恰恰与文学活动是一种有无限阐释可能的符号活动，是一种在现实社会中生成的感性经验的特征相吻合。如果说过去的文学研究只是为文学学科制造了一堆不能构成一元统摄、内部自洽的理论话语，从而在侧面宣告了文学研究的失败的话，那文化研究的多重视角和方法论综合则是在多元对话中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其实，在当代文化研究的冲击下，传统文学研究的场域已经在不断扩大，所谓文学普遍性、规律性开始逐步被广泛的文化经验所同化，一种新的视角开始发生。“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与批评的实践，因此它拒斥了概念、定义式的学科特征和本质主义的理论分析，正在把文学研究从学院、学科的传统和条分缕析的规范框架中独立出来，使文学研究更加关注现实经验中的具体问题，因此文化研究正使我们在一个更广阔和更现实的层面上注释文学，正在使文学研究这一本来充满生机与生气的学科重又焕发出生命的光彩。”<sup>[8]</sup>

这种回归也将直接导致文学教育社会实践接口的扩展，文化研究在当前成为一门显学并直接刺激了文化工业、创意产业的兴起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当代早已出现了不少先行者，陶东风先生就敏锐地指出，当今社会出现了一批“新型文化媒介人”，他们以艺术家的姿态进入社会，以手中的媒介力量推销他们自身发明的所谓艺术化生活。他们“很难用原先比较流行的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文人/资本家这样的二元划分进行归类，他们是一些复合型的人才，是善于把观念转化为商品、把文化市场化的人才”。<sup>[9]</sup>伴此而来的还有传统文化生产机构与传播机构性质的变化，过去的出版社、画廊、音乐厅的社会影响逐步由图书出版工作室、影视剧制作中心、创意工厂等取代，后者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对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的正确态度不应是把文化研究看做与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两个学科，而应当把文化研究看做是正确的文学研究——相比在科学化道路上一意孤行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多学科性、个性研究、感性阐释更符合文学的本来面目。而当文学学科吸取了文化研究的长处后，文学教育的困境也就得到了消解。消解文化教育困境的力量其实一直隐藏在文学中，文学教育真正要做的应当是开放自身，回归本性。

## 致谢

基金项目：现代性嬗变视角下的艺术自律终结研究（17YJJCZH05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艺术自律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流变关系研究（14Q0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汉语言文化专业学生核心素养评价研究（2016-XZ-026），湖北科技学院教研项目。

**REFERENCES**

- [1] Q. Tong, A course in literary theory, in M.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1999, pp. 5.
- [2] L. Feng, Formal studies and formalization methods, in J. Literary Studies, 2012, (1).
- [3] L. Feng, Who will recruit the literary theory tomorrow, in 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ournal of Sanxia University, 2006, (5)
- [4] H. Yu, The rationality and parasitism of literary theory, in J. Literary Review, 2007, (4).
- [5] Y. Ouyang,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talents: problems and ideas, in 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ujian Forum, 2012, (2).
- [6] Y. Wang, S. Shang, Postmodernism culture and aesthetics, in 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1992, pp. 16.
- [7] Y. Lu, Reaffirming cultural studies, in J. Thrivi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2010, (17).
- [8] J. Duan, From cultural studies to literary studies: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a review of western cultural studies, in J.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ournal of Petroleum University, 2003, (6).
- [9] D. Tao, Aestheticization of daily life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cultural mediators, in J. Thrivi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2003, (6).